

我有这样一个母亲

李南央

人生是有许多巧合的。1993年，父亲来美国参加科罗拉多大学的研讨会之前，威廉女士正在拍摄《中国革命》（China in Revolution）的第二集。听说父亲即将访美，约好了采访他。父亲到美国后，为了了解威廉女士拍片的宗旨和制片水准，我们特意从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的图书馆找来《中国革命》的第一集看。当放到中国抗日战争一段时，我突然发现一个讲演的女学生颇像我妈妈，但是没敢吱声，因为不知父亲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没想到老头子先叫停了：“再放一下，刚才那个镜头好像是范元甄。”我这才说：“我也觉得有点像。”我们把这段又看了一遍。“没错，就是她，这是范元甄在武汉欢迎世界学联代表团的集会上讲演。听说她的即席发言大出风头，王明一下就看上了，说‘这种人应该是共产党员’。事后找人了解，才知道范元甄早就是党员了。”父亲这样说。

母亲和父亲同时出现在一部历史纪录片中。前者的镜头几乎是一晃而过，记录下的恰恰是她一生中仅有的瞬间的灿烂（陈伯达在延安说过“小范是开花不结果的人物”）后者的镜头反反复复地在影片中出现，还被选做了片头。映现了他越到晚年越如晚霞般绚丽，学术名气和社会地位愈见升高。父母两人合了分，分了合，而最终归于殊途的人生之路所折射出的半个多世纪的沧桑变迁，令人唏嘘不已。

妈妈年轻时很是得意过的。先是抗战初期，担任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第三厅所属演剧九队负责人，后任重庆《新华日报》记者。周恩来夫妇视她为女儿。她到延安后，周恩来曾亲自写信给她，情意切切，还附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母亲一直珍藏着。解放初，她在协和医院动手术，周恩来去看张西曼，听说小范(过去的老人至今都叫我妈小范)也在这里，特意去病房看了她，轰动了医院。母亲在延安时，是有名的四大美女之一，还有四大美男子。三个美男都找了丑女，只有李锐和范元甄，大家公认，才华相貌不相上下，是天作地合的一对儿。我爸多次对我说：“你妈比我有才华。”好多认识我妈的老干部都对我提起过当年延安关于宪政的演讲比赛，我妈代表马列学院扮演国民党代表，结果把抗大扮演的共产党代表给辩论倒了。事后，大家笑传了很久。

妈妈跟我讲起过在延安两次见到毛主席。一次在清凉山的小路上。她上山，毛主席带着警卫员下山，主席闪到一边说：“小范同志你先走。”妈妈很是惊讶主席会知道她的名字。还有一次，她在窑洞前纺线，突然看到纺车前站住一双大脚，一抬头，是主席微笑着看着她纺线。可见，妈妈当年在延安确实是很引人注意的。

一二·九运动时，父亲代表武汉大学同代表一所教会中学的母亲在武汉秘密学联相识。1939年，母亲十八岁与父亲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结婚。那天，父亲说叶剑英莫名的兴奋，跑上跑下地给他们照相。妈妈后来告诉我，史良曾为她惋惜：“结婚太早了！”在我懂事时，母亲曾反复多次地向我提到此话，永远地后悔自己年轻时的选择，好像毁了她的一生。婚后不久，两人同去了延安。当时周恩来不在重庆，回来后还责问为什么把小范调走。好在知道我妈妈到延安进了马列学院，也就没再说什么。能进

马列学院,是妈妈一辈子觉得比人高出一头的资本。她认为‘抗大’女大”那是给刚参加革命的人办的,而马列学院是只有真正的成熟的革命者才能进去的。究竟是否如此,我不得而知。但是马列学院的资历确实让她认为具有与众不同的身份。1941年,延安精简机关学校时,成立了中央政治研究室,任弼时任主任,实际工作由陈伯达负责,妈妈在该研究室的国际组工作。

抗战胜利后,母亲随父亲北上热河,很感到失去了自我。延安第一次怀孕的孩子出生后就死了。第二个孩子(我哥哥)在承德撤退时的路上落生在卡车上。到热河后,她始终不愉快,跟爸爸不断地吵闹。直至被派往北平,参加了党办的北平《解放报》的工作,心情才好一些。以后南下,任接收长沙自来水公司的军代表,后调北京任石景山发电厂的副厂长。再以后就一直在航空工业部工作。解放初期没有现在那么多部委,航空工业部当时只是二机部的第四局。机关大院在宋庆龄的宅第旁,邻着积水潭,院内有一个小湖,我就在那儿跟妈妈学会了游泳。“文革”时被改成卫生部了,现在不知归了哪家单位。

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国家开始兴建大型国营企业,共产党要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管理这些企业。不记得是1956年还是1957年,妈妈被送进北京航空学院的调干班学习。毕业后,妈妈进了航空工业部自己办的第一个大型仪表厂,对外称青云仪器厂,对内代号232厂,当了总工程师。记得我曾为妈妈能在有代号的保密厂任职,感到特神秘,特兴奋。1979年我调到北京高能物理研究所工作,所办工厂里有从232厂调来的工人和工程师,他们都记得我妈,说我妈极有风度,特别能干。她的一生在那时达到了顶点,以后再也没有超过这个职位。退休后虽享受副部级待遇,只是个名义,没有什么实质意义。妈妈在这个新的,令她兴奋和满足的位置上并没来得及真正做些什么。1959

年庐山会议,爸爸被打倒,她立即一落到底,被分配到热处理车间当炉前工,接受改造,身体随即一下子垮下来。刚解放时她得了甲状腺机能亢进,北京协和医院在她身上第一次由中国人自己做了甲状腺切除手术,没有经验,切了十分之九。这时一下从亢进变成机能低下,一点办法也没有了。只好靠吃人造甲状腺素维持身体的新陈代谢。她的精神似乎也自此垮掉,再也没有恢复。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她短暂地恢复过一段工作,在航空部技术局总技术处任处长。但是很快‘文革’就开始了,群众专政,干校劳动,回京没等到分配正式的工作就被离休处理了。我的记忆中,妈妈没有高兴的时候,也不允许家里有欢乐的气氛。记得有一年从陕西的工厂探亲回家,因为自己自由生活惯了,忘了家里的规矩,一边干活,一边哼起了歌儿。妈妈立即厉声叫了起来:“你有什么可高兴的 我们这个家是没有欢乐的!”

我是1950年在长沙出生的,1952年随父母到了北京。从记事起,我就不喜欢家里的气氛,因为爸爸妈妈老吵架。我两岁进全托幼儿园,七岁住校,两个礼拜回家一次。什么时候回家,只要赶上两个人都在家,就什么时候吵架,吵得昏天黑地。说是吵架,其实从来都是妈妈一个人吵,没听爸爸吱过一声。他总是坐在沙发上,背靠在那儿,双手交叉在胸前,双目紧闭。妈妈的骂词永远是一句话:“说呀 你说呀!”最厉害的一次,只听屋子里哗哗啦啦,像是砸碎了玻璃的声音,我终于忍不住,在走廊里“哇”地一声哭了起来。妈妈出来抱着我和阿姨哭成一团。可我不是因为同情她才哭的,而是太害怕了。第二天,爸爸脸上贴着橡皮膏去上班,我羞愧得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楼上楼下的邻居早就知道我爸爸妈妈老吵架,这回爸爸单位的人也都该知道了。妈妈摔坏的那面很好看的椭圆形的镜子,像爸爸的脸一

样也用橡皮膏粘好，又用了很多年。五十年代那种造型尺寸的镜子是很少见的。我常常小人儿一个，对着破镜子发呆，叹惜这么好看的一面镜子贴了橡皮膏有多丑。爸爸妈妈没有能够像这面镜子破镜重圆。我那时总闹不明白妈妈到底让爸爸说什么，而爸爸为什么就是永远地不开口。等我长大后才知道，很多时候是为了我奶奶吵架。

爸爸妈妈在奶奶问题上的矛盾由来已久。父亲是独子，十七岁离家进武汉大学读书。父亲自己坦承当年并未好好学习，闹了革命。奶奶听人传话，知道儿子在闹革命，很是危险，从长沙赶到珞珈山监护独子。没想到父亲为了找党，1937年5月竟不辞而别，悄悄北上北平。自此再未返校，也没回过家，奶奶当时几乎急得发疯。以后抗战，内战，音信全无，生死不知。奶奶只好将女儿（我的二姑）的儿子改名姓李，以继承李家香火。

1949年长沙解放当夜，父亲突然出现在奶奶家。这位清末女子师范毕业生，三十二岁守寡，不愿屈从婆母管制，一人含辛茹苦，靠借债变卖旧衣物维持生计，供养子女读书的倔强老人，没有像一般母亲见到生死不明的游子突然归家，与儿子抱头痛哭，而是一个耳光掴了过去。我爸当着警卫员的面跪在了奶奶面前，请求奶奶原谅这个不孝的儿子。我妈妈两个月后到长沙，听说此事勃然大怒，回去就吵。认为我爸身为共产党的干部，却给地主母亲下跪，是严重地丧失了阶级立场。其实我奶奶根本就不是什么地主。我爷爷1905年到日本留学，在那里成了孙中山的第一批同盟会会员，后又是民国初年的国会议员，1922年就去世了。奶奶回到平江老家，从婆母手中分到一些田地，但由于闹红军，田租收得很有限，根本不足以为生。

1959年奶奶从沈阳我的二姑姑家经北京转返长沙大姑姑处，想到儿子家住几天，以便回到长沙跟亲友们谈起来，有个面

子,终于在儿子家里也住过了。爸爸恰好在外地出差,知道我妈绝不会让奶奶进门的,偷偷让秘书将奶奶安排在招待所。奶奶大骂儿子不孝,不许老娘进家门。我爸爸真是里外不是人。后来刘澜波(刘澜波为当时的水电部部长,我爸是副部长)把奶奶接到他家住了些日子,才回长沙。我妈由此恨透了刘澜波;“文革”中没少揭发他。奶奶一辈子就想跟儿子住一阵。老人封建,认为有儿子而要住在女儿家,是天底下最没脸面的事。1979年爸爸平反,奶奶又要跟儿子住,两个姑姑商议着把奶奶送到北京住一阵。还未成行,老人就去世了。可叹奶奶一生住一住儿子家的愿望终未能实现。

1977年我去长沙看姑姑,并与姑姑商议给爸爸平反的事,第一次见到奶奶。过去在我的印象中,都是妈妈灌输的故事,奶奶是个恶霸地主婆,又刁又狠,及至见面,才知道是一个极瘦极弱的老人,且很糊涂了。拉着我的手,总是问,你认识李厚生(我爸原来的名字)吗?老人总说这么多年不见他,也不看娘。我姑姑就在她耳边吼:“明伢子(我爸爸小名)被关起来了,不是不看你,是来不了。”1980年奶奶去世时,爸爸正在陪美国陆军工程兵访华团去南方参观的路上。得到消息,在火车站遥望长沙方向,深深鞠了三躬。爸爸是共产党内少有的有人情味的干部。而妈妈正好相反,大义灭亲;“亲不亲阶级分”,怎么可能不吵呢?

我爸的用人路线,也是吵架的另一原因。五十年代在水电建设中,爸爸重用了国民党政权留下的老技术人员,对他们很尊重,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反右时,水电系统被打成右派的人数很少。我自己就亲眼见过爸爸对有些党的干部很是随便,但是对技术人员总是未见有半点怠慢。爸爸当年在水电系统有一句著名的“反党”言论:“老干部要认真学习知识、文化,否则就不要老狗挡道。”妈妈却是“左”的,极为反感这些老知识分子。跟我

爸共过事的老技术人员都记得我妈的那张冷脸。妈妈在“文革”中常对我说,你爸一贯右倾,建国初期,就专用国民党人员,他的秘书、司机,都是那种最没觉悟和最糊涂的旧社会留用人员。也幸亏爸爸用了这样的人,他们在爸爸倒台后没有揭发过一个字。否则老婆、秘书、司机三管齐下,他大概早就没命了。他的秘书还曾试图救助他,不识时务地替他辩解,说李锐在知识分子中还是非常有威信的,有些工作上的意见分歧,不应该算是反党。幸亏这位秘书是那时机关中少有的三代血统工人出身,才免遭同时被整肃的命运。

尽管妈妈爸爸老吵架,可我小的时候妈妈从来没有碰过我一下,也不记得跟我红过脸。最厉害的一次是因为我胡闹得太大了,妈妈操起一个小凳子向我砸来,不过没有打着。我小时候哮喘很厉害,犯了病,嗓子眼儿就像拉风箱呼呼地叫。一次,外边下着大雨,我又犯病了,妈妈骑着自行车,打着伞去六铺炕商场给我买药。去商场的路是煤渣铺的,坑洼不平,妈妈一手打伞,一手扶把,再加天黑、雨大,没看见前面的一个凹坑,一下从车上摔了下来。看着一身泥水满脸是血的妈妈拿着药进了家门,我和阿姨都吓坏了。阿姨狠狠地对我说:“你要是长大了不孝顺你妈,就叫狗吃了!”这话我是记住了,一直记到现在。1991年到了美国,妈妈来过一封“信”,只有这么一句话:

李南央,电视机以松下 25 吋,平面直角,遥控,多制式为好。视你经济力量而定。母

我二话不说,就要寄钱。先生和女儿都反对,说她不能算妈。可我记着妈妈那一脸的血。她这辈子没有什么高兴的事儿,如果买个彩电能让她高兴,就给她买。

在我九岁的时候，家里没有了爸爸，他去了北大荒劳改农场。妈妈失去了发泄的对象，我就成了爸爸的替身，挨骂自此成了我的家常便饭。那真不是人过的日子！常常整晚上地挨骂，不许睡觉。每次开骂总是车轱辘话：“你从小心眼就狠毒，三岁就说打死妈妈。你和李锐一个样。”可我真是不记得自己三岁时在什么场合，因为什么说要“打死她”。心里说：“当妈的记三岁小孩儿的仇，真是没意思。”阿姨说，我见了我妈就像耗子见了猫。放了学，只要听到妈妈在家，就轻手轻脚溜进同阿姨合住的房间，再不出来。我妈说我从不叫她妈。我心里其实是对她没有爱。妈妈对我永恒的咒骂就是：“你这个小李锐，你跟你爸一模一样！”每次有客人来家，我都提心吊胆地防着那句话：“这丫头越长越像李锐。”可总有些不识相的大人爱这么说。他们根本不知道，李锐是这个家庭一切罪孽的源泉，是提不得的。

我妈特爱讲大道理，很注重对我们孩子的思想教育。每年放暑假总要买书，大多是所谓有教育意义的。可我却偏偏不可救药，总想着那些妈妈不让看的书。在小学，我就偷偷翻遍了家中书柜里的所有文学作品，《安娜·卡列尼娜》、《静静的顿河》、《天才》、《傲慢与偏见》、《子夜》、《海底两万里》，还偷偷地用每月的零花钱买小说。《林海雪原》、《苦菜花》、《迎春花》、《朝阳花》、《这一代人》、《乘风破浪》，都看烂了。书都是钻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看，或者午睡时看。中午我妈自己要睡觉，是绝不会来查的，阿姨也不打小报告。最使我妈生气的是，我竟然到我爸爸那儿要钱买书。那次是大发雷霆，一晚上没让睡觉。我坐在床上，困得东倒西歪，听着她在里屋打呼噜，心里那份儿恨哪。

最可怕的是我妈的午觉，要是在那时弄出了声响，吵了她的瞌睡，你就等着挨几个小时的骂吧。我学会了完全不出声地走路，开门不弄出一丝声响。可是楼上邻居的动静是免不了的。

我妈老让我上楼去告诉人家中午不要走动。“妈妈是最革命的”我心里想；革命者不是连生命都可以牺牲吗，怎么连楼上走路的声音都不许有呢？再说人家也不是故意的，怎么能好意思让人家不要走呢？可嘴上却是从不敢违抗母命的。红着脸敲开邻居的门，听人家的冷言冷语，看人家的脸色，那种滋味儿，那种难堪，真是无地自容。我就写日记，把对妈妈的疑问、不满都叙述在日记里。我那时发了疯地想当兵。报纸上，电影上把解放军说得太好了。我在日记里说：“我没有母爱，也不需要母爱。我将来当了兵，在连队里有指导员、连长关心，爱护我。”为了不让妈妈发现我的日记，我到处藏。有一次，妈妈发脾气，讥讽我：“你小小年纪，还母爱，母爱的，满脑子令人作呕的资产阶级思想。”我才知道，小孩子是永远藏不过大人的。就再也不敢在日记里写对妈妈的看法了。可是这点自由吐苦水的小天地都被剥夺了以后，我对妈妈是真真儿地没了感情。也没有了一丝毫的尊敬：“偷看人家的东西，太不要脸！”

我小时候喜欢军事体育。初中一年级的暑假，趁妈妈在南方疗养，参加了西城区少年之家测向队，还和另一个师大女附中的同学合作，拿了当年的北京市少年女子组团体第一名。可是妈妈一回来，发现我着了魔似地跑测向队，说我满脑子资产阶级锦标主义，个人英雄主义发了疯，跟李锐一样，非让我停止活动不可。后来北京队想要我当专业运动员，教练到家里来做工作，被我妈大骂一顿。教练从我家出来，脸上连血色都没了，气得浑身哆嗦：“没见过这样不讲理的老干部！”测向队是呆不成了，我又偷偷参加了少年宫的射击队，很快从三队升到一队，夏天要到昆明参加全国比赛，选拔国家队。每次活动，都要想出各种办法编造回家晚的理由。星期天活动的谎话是最难编的，只好常常缺勤。我自认是从小爱说谎，但从认为我是妈妈说的那种从

小爱编瞎话、品质恶劣的坏孩子。我至今认为凡是小孩子说瞎话,那必定是大人的错,一定是大人没给孩子说真话的空间。我现在最不能听的就是大人说自己的孩子:“这个孩子总爱撒谎。”但凡听到这样的话,我一定要立即为孩子辩护:“最好先自己检查一下做家长的错,自己是否给了孩子说真话的条件。扪心自问,为什么自己养的孩子不跟自己讲真话。”

后来,文化大革命了。我在学校挨斗,回家一言不发,精神极其沉闷。妈妈大概看出有什么不对,问我怎么了,态度极和蔼。我有些受宠若惊,在那种冷酷的环境里,感到了一丝母爱的温暖,不觉地流了眼泪。告诉说,自己因为爸爸的问题,也有她的因素,在学校里挨了同学的批斗。还没等我说完,妈妈的嘴角向下一撇,露出了极为幸灾乐祸、可有机会报复的冷笑:“啊哈!你不是一向标榜自己不要母爱,自己最坚强吗?哭什么!跟我说什么?你在学校挨不挨斗,跟我没有关系,不要往我身上扯。那是你自己在学校一定有问题。以后,你不要再跟我讲这些事情。你自以为了不起,自以为坚强,就不要以为还有妈妈。我在机关挨斗,又向谁去哭?我那时还不到十六岁,看着妈妈那狠毒的近乎狰狞的面孔,只觉得自己向一个大冰窟窿里沉下去,从里到外地冻僵了。从此以后,我的心门是永远地死死地向母亲锁住了。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麻烦、痛苦,从不再向她诉说一句,自己默默地顶住接连不断的厄运。”

后来我家被赶到一个大杂楼,我们住在一楼把角的两间屋。周围的男孩子知道只有一个女孩子守在这里,而且是狗崽子,把窗户的玻璃都打碎了。我用纸条一条条地贴好。邻居强迫我一个人交全楼道的电费,只因我家有电视和收音机。我当冲压工,在工厂出事故受伤,这些我从没告诉过妈妈,也不向任何人诉说。直到有一天,小姨从武汉来北京看病,顺便来看我,看到了

我居住环境的险恶，便给我妈妈写了一封信。告诉她无论如何要想办法跟机关说，要搬家。这样我妈从干校跟军管会交涉，我们从大杂楼搬到一个与另一家合住的单元里的一间七平米的小屋。五六个一同进厂的女学员帮我东西搬到三楼。我自己像耗子一样，一件件地把东西拖进屋摆好。但是这就成了我后来十几年挨骂生活的第一罪状。我在这里住了很短的一段时间，就去了陕西的三线工厂。妈妈从干校回来，挤在这么一间小屋，又根本不会同邻居相处，可想而知心情有多恶劣。后来我每次从陕西回京探亲，大概只有一天的好脸，接着就是没完没了地因为房子骂我。就因为我自私，只顾自己，丢了原来的两间屋，一家人挤在这么个七平米的地方。然后就是你从小就坏，跟李锐一样。妈妈从来没问过我那些年是怎么过的。妈妈下放湖北干校，我一个人在北京要给她寄那没完没了的包裹，她的每件东西要在哪家商店买，什么颜色，什么牌子，在来信中都是严格规定的，我永远做不到一次就买对。邮局的规定也多，这么包不行，那么包也不行，常常一整个工休日都用在跑邮局上了。那时还要给在东北插队的哥哥寄东西，还要惦记着住在留守处只有八岁的妹妹，工休日接她回家，给她做点好吃的，带她出去玩儿，尽量让她感觉到世界上还有一个亲人在关心她。所有这些，妈妈从来没有问过，她也从不问我在工厂做大型冲压工，只有十七岁的女孩子是怎么对付那一分钟要抡十七次的好几公斤的大钢板的，吃得怎样，安全怎样。

不过，我并不是这个家里惟一遭到妈妈虐待的。

我的大舅(我妈妈的大弟)，用我爸的话，是个很有才华，非常能干的人。能得到我爸如此评语的人是不多的。他一直在武汉长江航运局当会计师，一生贫困，郁郁不得志，五十岁的壮年就得了肺气肿去世了。他是四个弟妹中受我妈害最大的。快解放

时,大舅和一个一起唱戏的戏友姑娘结婚了。姑娘的父亲在武汉解放前带着小老婆跑到台湾,留下大老婆跟着女儿女婿。我妈比爸爸晚两个月南下,一进武汉,就领着我的两个年轻、一心向往革命的姨斗争大舅。要他交代是如何帮助老丈人逃往台湾的,家里替他藏了哪些财产。这真是子虚乌有的事,大舅当然不承认。为了表示革命干部不能包庇亲人,我妈一状告到舅舅的单位,单位来人抄了家,还给舅舅连降两级。“文革”期间更是全家被下放农村。我“文革”中到大舅全家所在的湖北烟墩农村去看他们。那里的水,一块雪白的新毛巾放下去,立时就变得黑黑的了,据说因为池塘里的水含油太多的原因。瘦弱的小表弟们要到很远的地方挑来稍干净的水饮用。即使这种水,也要先用明矾漂过才能用。那几天我尝到了真正的亲情。舅舅,舅妈和几个小表弟,舅妈的妈妈(那个国民党军官的大老婆)都是那么好的人。舅舅跟我讲了好多他所知道的我爸爸的事儿,说我爸爸如何有才气。对妈妈,他没有任何的埋怨,只是说她太革命了些。多么善良的人。临去世前,大姨到医院去看他,告诉他我爸爸放出来了,我也回到了北京。他高兴极了,又问:“悌忠呢?”意思是怕我情况好了,会像很多高干子弟一样甩了工人出身的患难丈夫。

我的小姨在跑日本(按 抗战逃难)时,小小年纪受了惊吓,得了心脏病,也是不到五十岁就去世了。最后一次犯病,她写信告诉我妈,想借些钱再看看病,争取新的希望。妈妈当即寄了二百元钱。可是事过没几天,就又一封长信追过去,把小姨大骂一通。说她没有良心,范家的人都没有良心,从来没有人关心过她,只跟她要钱。殊不知她的身体也极糟,就因为给小姨寄钱,这个月没钱买补药、买海参。小姨读了信,当下差点没气死,立即让儿子把钱寄了回去,几天后就咽气了。妈妈的信在那本来

就已很脆弱的生命上,踹了最后致命的一脚。小姨临死前,对大姨说:“你们要有良心,我死后,绝对不许通知大姐。”

我的小舅五十年代在北京大学读政治经济专业,学校领导本准备送他去苏联留学。因为我妈既是小舅的监护人,又是老革命,就征求她的意见。结果我妈一句好话也没说,反说我舅舅思想比较落后,小资产阶级意识较浓,不适于出国学习,断送了舅舅出国深造的机会。

我大姨(我妈的大妹妹)是我妈南下时介绍参加工作的。八十年代为了安抚大批退下来的干部,中央定了一个杠杠,凡是1949年10月1日前参加革命工作的,都按离休干部对待,享受100%的退休金和其他一些补贴。我妈却对我大姨说,她记得她是11月后参加的工作。幸好当年我姨参加工作填的表还保留在商业部的人事部门。管事儿的干部说:“这回她可害不了你了。”看来我妈害人的名声是够可以了。

在我们家遭罪最大的还要数老阿姨。阿姨原来跟着我姥姥做事(女佣),解放后被我妈要到北京。爸爸去北大荒劳改后,妈妈有时发了疯地打几十页的电报去吵架离婚。她知道邮局是不会发这么长的电报的,自己不去,逼着家里的老阿姨一趟趟地跑。阿姨顶着盛夏正午的毒太阳,迈着一双小脚,往返一趟就要四十多分钟。而且先要挨邮局人的训斥,后要遭我妈的谩骂,常常坐在屋里掉泪。我心里替阿姨愤愤不平,可也不敢跟我妈讲理。我妈从干校回京后,阿姨已五十多岁。每晚只能在厨房用三张小方凳上搭块板子当床,挤在灶台间睡觉。后来家里在前边的楼里的五层又分到别人家单元里的一间屋子,妈妈就让阿姨顿顿做好饭,端到那里给她吃。饭菜稍凉了,就要骂人。我很庆幸后来能够帮助阿姨。1970年我去陕西后,一年回家探亲,阿姨嘱我把她在我妈这里的情况如实告诉在河南的侄女婿,

让他们编个瞎话说家里出了事,无论如何要让阿姨回趟老家,阿姨这才得以脱身。后来我和先生正准备把阿姨接到陕西沟儿里(我所在的三线厂在山沟里,我们都这么叫)度晚年时,我爸恰好解放了。阿姨很高兴地来到了我爸家。同爸爸 1979 年结婚的也是老干部的玉珍妈妈,对阿姨就像自家的老人。自己干的活比阿姨还多。1988 年阿姨觉得自己干不动了,执意要回河南老家。我 1994 年第一次回国探亲,玉珍妈妈还特意把阿姨接到北京住了好长一段时间。阿姨说她没有想到自己的晚年会这么好。但是她落了毛病,不能提我妈,一提就要失声痛哭。她受我妈的气和折磨实在是太多了。我妈这个最‘革命’的人,对待阿姨却是绝对的资产阶级,而且是那种最坏的资产阶级大小姐。

我和妈妈彻底闹翻是在周总理去世的那一天。我记得很清楚,我和先生,那时是我刚交的男朋友一起从陕西回京探亲,约好一起去动物园玩儿。没想到一早就听到了总理去世的消息。我们去商店买了黑布,裁成黑箍带在手臂上后就直接去了天安门广场。广场已降了半旗,可还没有什么人带黑纱,人们用诧异的眼神注意我们胳膊上的黑布。第二天带黑纱的人才渐渐多了起来。当晚回到家已经十点多了。妈妈和妹妹住在前边的五层楼的那间屋,我和老阿姨住在原来的七平米小屋。我直接回到自己的住处,老阿姨一直没有睡,在等着我。我一进门,就急急地对我说:“你妈发了大脾气,你快点过去看看吧!”我提心吊胆地上了楼,一进门我妈就问我野到哪儿去了,还没容我开口,骂声就劈头盖脑地砸过来。说我在总理逝世的时候同男朋友去玩儿,太不要脸。然后说悌忠的爷爷是伪保长,悌忠本人老奸巨猾,不是好东西。让我一定断掉这个关系,否则就和我断绝母女关系。说我在外面乱搞,和人家弄出孩子来,她也不管。这时我实在是忍无可忍了,觉得她怎么可以这么污辱自己女儿的人格。就回了一句:“你胡

说八道！这就更不得了了，她一下子歇斯底里大发作，连声让我滚。妹妹躲在被子里‘呜呜’地哭出声。我一路哭，一路走回自己的住处，伤心地问阿姨：“阿姨你告诉我，我到底是不是我妈生的？”这么些年，我真是越来越不信我妈是我的亲生母亲，觉得后妈也不会这么坏。当晚思前想后，下决心走自己的路，该是从妈妈的阴影下走出来的时候了，否则一辈子都不会有自我。第二天一早，收拾了自己简单的行李，离开了家。自此，大概就回去了可数的几次，但是再也没有在家里住过了。

我最后一次见到母亲是 1994 年圣诞节，那是我离开大陆四年后第一次回国探亲。跟妈妈则不止有四年没见了。出国前，我没有去看她，那时正值‘风波’后，我的处境微妙，又不了解她的态度，怕她再来个‘向组织汇报’之类的，没去道别。那应该是五年后第一次见面。事先哥哥帮我打了电话，证明愿意见我们，于是约好了时间。为防不测，嫂子和小侄女要跟我们一起，被我妈一口回绝：“你们来干什么？我们已感到不大妙，可能会挨骂。哥哥说：‘骂，你就听着，别还嘴。’”我带着女儿去了。一进家门，那久违了的黑沉、抑郁的感觉就一股股地压了过来。难怪大姨总说，去一次，回来要压抑好几天。多少日子心里的阴沉都去不掉。妈妈开了门，我心提到嗓子眼儿，不知这几年来的第一面会是什么样儿。“来了，进来吧。”忙忙（我女儿的小名）长这么大了，变得像个女孩子了，小时候完全是个男孩儿样。“我心里揣摩着：‘行，开头还不错。’”

这四室一厅的单元我只来过可数的两三次。家具依然是早就认识的，到处积满了灰尘，没有什么像样的东西。屋里惟一值钱的，大概就是那个当桌子腿儿的大金鱼缸架子了。还是五十年代，爸爸从琉璃厂买来的。大金鱼让我淘气鼓捣死了，大鱼缸不记得命运如何。这个古色古香，年代越久便越发亮的架子是

“文革”中被扫地出门后,妈妈惟一没舍得卖的东西。普通家庭那时根本没有的三件套的沙发,大的才卖了四块钱,小的暂时寄放到亲戚家。电视机本想卖,可寄卖行只给四块钱,无异于抢,一赌气,又拉回来了。妈妈存了多年的一把象牙梳子,一个很精巧的景泰蓝钵子,现在是很难得看到那样的手工了,是我拿到琉璃厂卖的。记得得了有二十多块钱。一套十二件的小瓷猫,人家说什么也不要,说不是古董。我就是闹不懂,多可爱呀,不比梳子、钵子好。这是爸爸当年从展览会上买回的样品,后来满大街都卖这种小猫,可是绝没有我家这套这么逼真,这么精巧。直到现在我还常想起这套小猫,好像是抄家后不见了。家里几大盒爸爸从苏联带回的幻灯片,破四旧都没舍得处理,那时也不翼而飞了。其他家具我知道都是公家的,如数还给了公家。我们整个儿成了无产阶级!这个金鱼缸架子我们在上边搭了块板子当了饭桌。现在,它还是老样子,我就坐在它的旁边。

妈妈说:“自己倒水吧。杯子脏,我也没精力洗,你自己洗洗。”杯子上确是盖着浮尘,我没洗,倒了一杯凉开水。妈妈坐在了那张老藤椅内。我很熟悉它,冬天总是被盖上各种棉垫。屋里没有沙发,剩下的是几张方木凳儿。与其说是保持了艰苦朴素的革命传统,不如说这屋到处可见的令满屋没有一件使人感到有生气的物件,透着屋子的主人对生活那么地兴趣索然,只是凑合着活着。一种凄凉的感觉在我胸里胀着,眼睛只觉涩涩的。我从提兜里拿出带来的东西。一包西洋参,一套不粘锅炊具。我说:“知道国内也能买到西洋参,但听大姨说,常有假货,给你从美国买了点儿。现在的理论是老人少吃油,给你买了套不粘锅,炒菜可少放些油。”不料妈妈接过我的话头:“范元坤,她怎么会买到假西洋参呢!陈忠介(我姨父)在商业部医药局工作,他们才是享受最好的东西呢!”那种尖酸、刻薄的老调直刺我的心

口。我暗暗骂自己：“好好的，干嘛要把大姨扯上受过。”我太知道天下再也没有姨父那么老实的人了。他从来没给自己走后门买过药，从来是我妈要他买药，他没办法拒绝，才硬着头皮办的。我太熟悉我妈这种德行了，用人走后门给自己办事，反过来又把别人批一通。我知道，我给了我妈一个很好的开骂的由头。

果不其然，从大姨开始，三下五除二，就径直地朝我爸去了。“那个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分子。‘文革’完了，以为自己平反了，又当了部长了，当了中央委员，了不得了。在我眼里，他一钱不值，他还不是从组织部下来了。告诉他，苗苗（我哥哥的小名）是在卡车上生的，所以有缺陷。这个儿子得给钱，他得管。李锐现在又有老婆了，又当官了，有钱了，他必须要管这个儿子。这一点你一定要告诉李锐！”从开骂，我一直直视着这张脸。过去多少年，我总是低头听骂，心里翻江倒海地难过。这次，我极冷静地端详着这张脸，听着，感叹着“人怎么会活得只有恨，而且这么刻骨地恨？”然后又骂到我的朋友。这个朋友的妈妈当年在延安也是有名的女强人，是妈妈的熟人，我去年托这个朋友春节时看过我妈。朋友回来后写信告诉我，我妈很激动，痛哭流涕地向她诉说跟李锐的事。只可惜她什么也没有记住，只记住大意是“李锐一贯反党，与党不是一条心”。临走这位朋友留下了在大街上匆匆忙忙买的一个大果篮。哪知道她赶上了奸商，表面的好水果下铺的是一层烂橘子。老太太蹬蹬地跑到另一个房间拎来了篮子，把篮子举到我面前：“就是这个篮子。送烂橘子，你知道在旧社会这是什么意思吗？这是骂人呀！说是叫朋友来看我，实际叫她来骂我！”这可是典型的不讲理。要骂应该骂奸商太坏，怎么怪到买东西的人？退一万步，我的本意如果是派朋友来骂她，怎么会想到这种旧社会的伎俩？要知道我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怎么会知道这种旧社会拐着弯儿骂人的破玩艺儿。